

## 唐詩與文采

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在想，什麼是文采呢？這真是一個抽象的問題，難以回答。直到我讀到了李商隱。

當一個人說，他愛一個人愛到死的那一天。此時的他，深情卻直白。但若他說至死不渝，則更文雅了一點。然而，如果他說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，全文沒有一個愛字，卻表達了至死不渝，表達了愛一個人愛到死的那一天，表達得更加刻骨銘心。這就是文采。

在唐詩三百首裏，李商隱很多詩歌都是情詩。譬如這句，常常被人說是謳歌老師奉獻精神的詩，通讀全詩的內容，其實更是一個情深意重的表白。李商隱筆下的愛情是濃烈的，繁複的，所寫的情詩，不是表達相思，就是表達單戀，要不就是愛情中的求而不得。

同樣地，我常常想起高適的《別董大》。當我們為一個即將遠行，但是對前途沒有什麼信心的朋友鼓勵，我們會祝他一切安好，萬事順遂。往往也僅此而已，總覺得意猶未盡。但如果我們說，莫愁前路無知己，天下誰人不識君。這下突然明亮了起來，突然開闊了起來。

### 自由談

郭曉懿

來，好像朋友整個人生的路都被照亮了。這就是文采。

然而，是不是唐詩越有文采越好呢？是不是只有有文采才是好詩呢？實則不然。

唐代宰相李紳所寫的《憫農》二首，就是非常直接，毫無修飾，卻流傳千古。《憫農》其一，春種一粒粟，秋收萬顆子。四海無閒田，農夫猶餓死。多麼直白的話語，言簡意賅，前後句卻蘊含着強烈的轉折，明明滿載而歸，勞作的農民卻是餓死的對象。全詩滿懷對農民辛苦而無所得，甚至餓殍遍野的控訴。其二更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必修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相信每一個人在小時候，都學過這首重農勞動的詩歌。言語樸實無華，意蘊豐富，故而傳頌千古。

但是，歷史是如此諷刺，年輕時候寫了《憫農》二首的李紳，當了官之後卻驕奢淫逸，蠻橫跋扈，全然沒有當年對勞動人民的同情。年輕時候想的事，說的話，年長之後，特別是得到高位之後，未必是這麼做的。這就是人生和歷史有趣的地方，遠遠比唐詩宋詞，或是文采本身，更加耐人尋味。

## 走讀灣仔

早就聽聞灣仔日月街至利東街一帶進駐不少時尚小舖，上周末與十數位關注本地歷史的愛書人同遊，漫步街巷，更能細味灣仔華洋雜處之美。

由永豐街起步，不消數分鐘，便來到日月街。三條街得名《三字經》中「三光者，日月星」，蓋因香港最早的發電站正建於此處，而電力能帶來光明，臨近街道便因此得名。一百多年過去，發電站早已遷至北角再遷往鴨脷洲，唯街名存續。而今，三條街上聚集不少時尚餐廳、文創小店，與傳統洗衣店和茶餐廳等毗鄰相依，給「老灣仔」們的平靜日子增添不少熱鬧和驚喜。

街道這邊，德如茶餐廳的鐵皮檔讓愛懷舊的人們順着回憶，懷想兒時與屋邨三兩好友同飲紅豆冰的無憂日子，街那邊，大洋彼岸遠道而來的人氣咖啡品牌「藍瓶」（Blue Bottle）引來一眾潮流男女打卡聚會。短短半分鐘腳程，時光竟穿梭百年而不露痕跡，這是灣仔

的魅力，也是香港的魅力。

沿皇后大道東一路東行，走過船街，步入莊士敦道。修頓球場在左，和昌大押在右。老灣仔稱呼修頓球場為「波地」，因為這是鬧市中難得的踢波（踢足球）場地。而在日佔年代，日軍槍殺的平民眾多，修頓球場被用作刑場，沾滿鮮血。香港作家小思童年時住在灣仔石水渠街一帶，曾親眼目睹轟炸灣仔的慘烈，猶記得戰亂時外出，「回到家，鞋底和鞋邊上，都凝着血塊」。二戰後，修頓球場變身「大笪地」，小販販攤賣藝或賣物，晚晚熱鬧。早些年，曾有人提議將修頓球場改建為高檔住宅，遭到一眾老灣仔極力反對，稱其為「城市之肺」，吸納新鮮空氣，保證健康。幸好，灣仔至今仍留有這一片綠葉，在書店、文創精品店和時尚餐廳環繞中，與往來的叮叮車相伴，見證往昔與當下在此交逢重疊。

灣仔一片，原本名為「下環」，是港英政府劃定「四環九約」的最後一環。如今，西環、上環、中環仍在，「下環」已更名「灣仔」，既因其臨近港島背面海灣，或也因「仔」字親切，與此處相對中環的平民化景觀相襯。當日參與步行團的一位團友，曾是灣仔街坊，近年搬走，此次重訪，已認不出街道模樣。城市日日在變，留不住的，放在回憶裏，也好。



▲灣仔一景。

攝影：YK Wong

米酒的真名叫Bob，一個來自葡萄牙的年輕人，住在西貢，居港十二年。米酒是我送給他的花名兒，他太高了，一米九，我於是戲謔地叫他「米酒」，這花名兒後來很快就在我們倆建立起來的朋友圈中傳揚開來，叫得「家喻戶曉」。他也極為喜之愛之，還常常顧盼神飛地說：「我喜歡喝中國米酒，喜歡中國，喜歡香港。」

其實他還有另一個花名兒「燒鵝」，容我後面細表。

和米酒的邂逅是四年前的事情了。

某個禮拜一，我出了西營盤地鐵口，走到那段長長的石階上，下面走來一個年輕老外，經過我身邊時突然停下來，詢問一家法國酒吧的位置。記憶中我是知道那家酒吧的，指指身後的那條街，告訴他路口左轉，酒吧就在轉彎後的第一條街上。他連番道謝，大步走過我身邊。突然間，我細細回味了一下，好像腳步在轉彎後的第二條街，瞬間慚愧，掉頭幾步追上他，告訴他正確位置，然後我繼續走那段石階路。很快後面傳來跑步的聲音，回頭，他站到我面前，怎麼突然感覺他好高？我要費勁地仰望。

HK人與事  
王非

## 傳承精神命脈 活化非遺文明



十一月二十三日，「傳承精神命脈 活化非遺文明」中華文化遺產和國際非遺交流系列活動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開幕。活動一連五日舉辦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和中華非遺傳承精品展，以及民族音樂、福建南音與茶文化等非遺項目現場表演。

香港中通社

▲開幕儀式進行粵劇折子戲《胡地蠻歌》表演。

## 以足球之名



### 英倫漫話

江恆

卡塔爾世界盃已拉開帷幕，在英國持續熱議的一個話題，竟是東道主於賽場及周邊區域實施禁酒令，因為這喚起人們對足球流氓的那些不愉快記憶。

就在去年五月，於葡萄牙波爾圖舉行的二〇二一年歐冠盃決賽，由兩支英超勁旅曼城和切爾西對陣，但比賽尚未進行，兩隊的球迷便爆發衝突、大打出手，皆因這批來自英國的球迷想在深夜喝酒，違反了當地防疫限聚令，引發他們強烈不滿進而喋血街頭。對於這些所謂球迷來說，看足球比賽不能喝酒，而喝了酒之後又必定鬧事，輕則掛彩，重則出人命，用流氓來稱呼頗為貼切。

英國作為現代足球的故鄉，也是足球流氓的發源地。特別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，足球流氓像傳染病一樣地在全英各地蔓延，迎來新一波暴力浪潮，據統計平均每兩個球季都有至少二十多起大規模騷亂。在國際賽場更不乏英國足球流氓的身影，以至於人們一提起英國足球，首先想到的便是足球流氓。比如，前文提到的歐冠盃決賽鬧事，與二〇一六年歐國盃小組賽的打鬥比起來，堪稱小巫見大巫，當時上千英國球迷與數百名俄羅斯球迷發生鬥毆，雙方從賽場內打到賽場外，「戰鬥」持續了三天，多人被緊急送院情況危殆，警方要動用催淚彈和水炮才能止住暴力蔓延，英國足球流氓因此更加臭名昭著。

足球流氓引發的悲劇也屢見不鮮。最著名的當屬一九八五年震驚足壇的「海塞爾球場慘案」，當時為防止足球流氓滋事，看台已被築起隔離牆、鐵絲網來疏導球迷，但仍防不勝防，英格蘭利物浦和意大利尤文圖斯的球迷如乾柴烈火，在足球流氓的挑動下，衝突全面爆發，打鬥中人群互相推擠，最終造成三十九人死亡，成為歐洲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類似的悲劇在一九八九九年再度上演，英格蘭謝菲爾德的希爾斯堡球場發生擠壓和踩踏，令九十七人死亡，起因便包括警方誤以為闖入賽場的是足球流氓，從而令秩序大亂，加上球場的一些設計純粹為防範足球流氓，毫無科

學性可言，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當局被足球流氓嚇怕了。

這些足球流氓究竟是什麼人？他們又為何熱衷暴力？經典電影《足球流氓》（Hooligans）提供了一個最佳視角，該片以西漢姆聯和米爾沃爾兩支球隊為故事背景，講述了英國足球的場外暴力，充斥了各種血腥的群毆場面，尤其是主人公馬特以外來者的身份，教科書般地帶領觀眾感受他如何踏上一條通往足球流氓之路。鏡頭下的那些英國足球流氓們極度真實，有血有肉，在他們看來，鬥毆不僅是感情的宣洩，也是為所謂的榮譽而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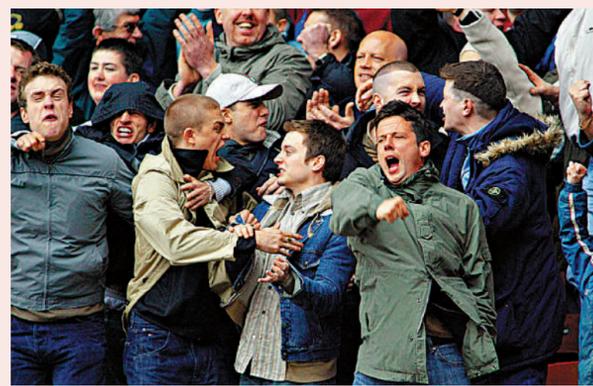
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·柯林斯在《暴力：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》一書所說，足球暴力的發生固然是為了尋找刺激，但這種解釋未免太過寬泛。就足球流氓身份而言，並不僅僅來自於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層人士，還包括很多白領社會精英，他們往往在賽場中野蠻鬥毆，之後又會搖身一變，從暴徒成為紳士，排隊坐公車回家，在車上給孕婦讓座。按秘魯作家巴爾加斯·略薩在《足球流氓：高度文明化的產物》一文中指出，他們是基於對文明社會的單調、規律、無聊感到不滿足，於是渴望着那些失去的東西：不確定性、風險、本能和激情。在他們有教養的裝扮底下，潛藏着被文明面具所壓抑的野蠻，而一旦遇到合適的機會，內心的野蠻便順勢回歸。

與此同時，足球流氓又明顯殘留有幫派的傳統，像聞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足球流氓組織，如阿森納的「槍迷」、曼聯的「紅軍」、布萊克

浦的「無賴」、謝菲爾德聯的「刀鋒業務幫」等，每個團隊的首領都有自己的跟隨者，形成三十至五十人的小團隊，成員大都是十五六歲以下的年輕人，都渴望證明自己，他們組織有素，知道如何快速地小跑，何時該聚集起來集體行動，何時又該四下分散。

專門研究足球流氓的心理學家沃爾格雷夫更認為，足球流氓還有種族主義和右翼狂熱主義的印記。心理分析理論家斯拉沃熱·齊澤克在《敏感的主體》一書中也提到，足球流氓的暴力等同於新納粹光頭黨的族群暴力，兩者都是狂熱地擁抱自身的身份認同。如同英國球迷在國外時，會高唱愛國主義歌曲和口號，回到國內會用歧視性語言羞辱他人，就像去年七月的歐國盃決賽之夜，英格蘭隊在主场敗於意大利隊，憤怒的球迷用種族歧視和侮辱性言語拿三名黑人球員出氣。

這當中也有種族主義受害者，比如以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漢姆聯隊著名足球流氓領袖卡斯·潘內特為原型的傳記電影《卡斯》（Cass），便講述這位被英國家庭收養的牙買加男孩成長過程中，不斷受到種族歧視的不公正對待，最終學會了使用暴力來贏得尊重的故事。運動作家大衛·哥德布拉特在《足球帝國：一窺英格蘭社會的華麗與蒼涼》一書中，也提到九十年代末改為種族主義與足球關係的事件，當中包括了南倫敦黑人少年史蒂芬·勞倫斯的遇害。套用英國老牌體育雜誌的話說，所有憤怒、宣洩和極右政治等，不過都是以足球之名的時代社會問題。



▲電影《足球流氓》（Hooligans）劇照。資料圖片

還是一個獨身主義者，喜歡安靜，喜歡獨處，香港本地朋友幾乎為零，除了不得不接觸的同事，他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歐洲朋友。

大家彼此介紹了一下，感覺很快熟絡起來。我問他要帶我去哪裏？因為三個小時之後我就要上班了。他竟然說：「信任我就跟着我。」我忍不住大笑，想不到這個如此害羞拘謹的年輕人，還能說出這麼有趣有哲理的話。

實在想不到，他竟然帶我來到了青山公路的深井陳記燒鵝。他說，燒鵝是他的摯愛，他常常一個人來買半隻燒鵝外賣，再來一碟青菜。我樂了，北京的烤鴨和香港的燒鵝正是我的摯愛。我和Bob的第一餐就在深井的陳記燒鵝吃，例牌一份燒鵝，新鮮出爐的燒鵝脆皮肉嫩多汁，讓我思念起北京烤鴨。我還特別為他點了一個椒鹽九肚魚和豉椒炒雞腸，這是他從來沒吃過的，吃得他讚不絕口，停不下來。在以後疫情如影隨形的日子，每次我們見面，一定會買一份燒鵝飯外賣，他太愛吃香港的燒鵝，以至於我一次次調侃他：「看看你啊，多麼像一隻大燒鵝啊！」他每次都只是笑，重複來去都是那一句：因為燒鵝，所以我才愛上了

香港吧。

我們就這樣相識了，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。我們約好只吃飯喝酒看風景，不談私人感情，不談風月，不涉及個人私隱。米酒像個大男孩，善良誠實直率，過馬路時一定讓我走在裏面，見到路上有寵物的便便，一定幫忙收起來扔到垃圾桶裏。去商場，他會攆着門一定等前後的人都進去了才最後一個進去，他總是說香港這裏多麼美，那裏多麼好……

米酒有一架巨型摩托車，他特別喜歡騎着摩托車，帶我去大帽山頂看夕陽，看遠處的深圳。疫情爆發前，他經常被派到廣州和深圳工作，他說他喜歡中國文化，喜歡中國食物，喜歡中國人。疫情自二〇一九年底以來一直持續，改變了全世界人的生活，米酒說他的許多來自歐美同事朋友都離開了香港。我問他：「為什麼你不離開？」他說：「我和他們不一樣，我真愛香港，一天也捨不得離開。」

昨天，米酒發來短訊問我一個問題：「你來自北京，那麼，你是喜歡北京，還是更喜歡香港？」我回答：「我喜歡北京，也喜歡香港。我愛北京，也愛香港。」他回覆：「我也愛香港，越來越愛！」